

# 国际友人与中国“工合”运动

刘仕平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初期兴起的经济救亡运动,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如果以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作为这场运动的开始,以1952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财产和档案被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接管作为它的结束,这场运动前后共持续了14年。在这期间,它建立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遍及我国的18个省。对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战,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工合”的研究已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期间,主要搞清了“工合”的发展过程、“工合”经营的工业种类、“工合”的组织管理状况、以及“工合”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等。关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工合”的帮助,尤其是大批的国际友人在“工合”的发起、组织、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至今尚未见到明确的表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 一、国际友人是“工合”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组织者

国际友人对中国“工合”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利用特殊身份,协助组建“工合”机构。最初在中国创办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应归功于在中国生活并关心中国人民福利的三位外国人,他们是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sup>①</sup>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

区,仅上海一地的投资,就几乎占全国一半。1937年8月,日军开始攻打上海。国民党政府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动员沿海工业迁往内地。由于事前缺少必要的准备,又缺少大型运输设备,许多工厂没有及时迁走而被日军掠去。迁到后方的工厂,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厂址,又缺乏动力燃料,很难马上开工。许多技术工人流浪在后方,生计无着落。这样,在前方作战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后方却有大量闲置的机器和大批失业的工人。艾黎想,应尽快把后方工业组织起来,恢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斯诺夫妇,得到了他们的赞赏。斯诺夫人威尔斯提出,应该用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方法恢复后方工业,她的这个建议得到艾黎和斯诺的肯定。

1937年11月,在沦陷后的上海,中外人士共同成立了一个抗日组织,名叫“星期一聚餐会”,由胡愈之任主席。大家约定,每星期一晚上聚一次,研究上海地区的抗日工作。由于斯诺夫妇为人正直,在中国享有较高信誉,也被邀参加“星期一聚餐会”。在一次会上,斯诺夫妇提出了在后方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同。在1938年3月19日和4月3日的两次会上,大家议定,将“星期一聚餐会”改组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负责筹划、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由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任主席、艾黎为会议召集人。

“工合”设计委员会认为,在大后方兴办

工业合作社,应尽量争得国民党政府同意。但与国民党要员商议此事,必须有合适的人选。参加“工合”设计委员会的人中,有位年青人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秘书,名叫约翰·亚历山大。通过他,斯诺了解到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克尔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斯诺认为,说服国民党要员支持“工合”,这位大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在约翰·亚历山大的帮助下,克拉克·克尔接见了斯诺,并同意去武汉会见国民党要员。不久,克拉克·克尔在武汉会见了蒋介石和孔祥熙,提出了创办“工合”的方案。蒋孔二人表示同意。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作为在全国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的领导机构,由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总技术顾问。总技术顾问负责筹备组织工作。1938年6月,艾黎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着手筹备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在汉口正式挂出。但事隔不到一个月,日军就逼近武汉,“工合”协会不得不随政府迁往重庆。

“工合”协会的人选是到重庆后才定下来的。“工合”的领导机构分四层:理事会、总会、办事处、事务所。理事会共有20人,国民党方面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廷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其他各界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根据理事长孔祥熙提议,推举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总会人员由艾黎提供人选,以孔祥熙的名义聘请。总干事由原甘肃省民政厅长刘广沛担任,副总干事由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担任。总会内设业务、推进、技术、组织、财务、总务等六个组。总会在全国设立四个办事处。东南办事处设在江西赣县,西南办事处设在湖南邵阳,西北办事处设在陕西宝鸡,川康办事处设在四川成都。办事处之下设事务所,负责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具体

事宜。“工合”办的第一个合作社是宝鸡的打铁合作社,成立于1938年8月中旬。从此,工业合作社发展很快,数目日益增多。据1942年7月统计的材料,“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工合事务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产值达2500万元”。<sup>②</sup>这表明,“工合”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就。

2. 在海外建立“工合”推进会,筹集捐款。“工合”运动的目标是在大后方广泛组织工业合作社。在当时正处于战争条件下,政府和民间的财力都很紧张,完成这项任务困难极大。“工合”运动的发起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决定在海外建立“工合”推进会,广泛筹集捐款。

菲律宾是一个声援中国“工合”的国家。中国“工合”菲律宾推进会成立于1939年4月20日。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保罗·麦克纳特的夫人任名誉主席,布鲁克·弗雷博士任主席。这个时期,菲律宾属于美国的殖民地,由于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夫人出任“工合”推进会名誉主席,这就表明美驻菲当局是支持中国“工合”的。由于当局表示了态,菲律宾全国上下对“工合”的捐助是十分踊跃的,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菲律宾基督教青年党的加丝利小姐把在美国旅游时节省下来的1000美元存入银行,然后定期取出利息寄给中国“工合”。菲律宾青年杜汉高由于为“工合”募捐有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的奖励,他把自行车出租,将得到的租金再捐给“工合”。由于他积极援助“工合”,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将他杀害。

“从工合的外国捐款来说,美国占第一位。”<sup>③</sup>从1939年底开始,援助中国“工合”的组织陆续在美国的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大城市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工合”推进会已十分必要。罗斯福总统夫人同意做中国“工合”全美推进会的发起

人。经过紧张筹备，“工合”全美推进会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它由100名顾问和20名执行委员组成。罗斯福总统夫人受推举担任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司令颜录尔上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颜录尔上将给几百位有影响的美国人写信，要求他们支持“工合”。信中说：“在这个遭受严重破坏的世界上，存在着中国工合这样一支建设力量，对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是个极大鼓舞。工合正在自由中国的土地上，以小工业的形式，生产日用品，并为被战争夺去了生计的人们提供工作。”<sup>④</sup>由于进行了充分的动员，捐款不断从美国各地寄往中国“工合”。比较多的捐款有：中国赈灾委员会美国顾问团捐助的15万法币，阿克博尔德夫人捐助的1000美元，夏威夷饭碗委员会捐助的390美元，等等。1940年7月，斯诺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请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工合”五千万美元贷款。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工合”美国推进会主席颜录尔上将、著名作家赛珍珠、著名哲学家杜威等二十余人。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美国没有给中国“工合”这笔贷款，但罗斯福总统表示将把美国政府支持“工合”的态度转达给蒋介石。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还专门参观了部分“工合”工厂。除了菲律宾、美国之外，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瑞士等也开展了支持“工合”活动。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工合”筹集资金、摆脱困境提供了帮助。

3. 帮助“工合”排除阻力和破坏，维持其健康发展。由于“工合”是为抗日而发起的，因此，法西斯分子千方百计予以破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这给菲律宾亲日分子以很大鼓舞，他们活动很猖獗。就在“工合”菲律宾推进会成立大会召开的前夕，死心蹋地的亲日分子、

菲律宾总统奎松的秘书乔斯·瓦尔加斯，按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旨意，令警察当局吊销“工合”推进会成立大会的许可证。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麦克纳特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约见总统奎松时说：“只要美国国旗还在菲律宾上空飘扬，新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就要受到保护。”<sup>⑤</sup>由于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高级专员在菲握有很大权力，奎松只好让警察局收回成命，允许“工合”推进会成立大会如期召开。

“工合”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国民党中的一部分极右分子。国民党对“工合”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工合”初创时，前方战事紧急，作战物资十分匮乏，这时组建工业合作社，可以生产物资，满足前方需要。加之“工合”从一创立就深得人心，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不愿公开违背民意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从一开始，国民党就表示支持“工合”，行政院长孔祥熙还亲自当上了“工合”的理事长。但国民党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任何危及它社会基础的变革都不能容忍，“工合”当然也不例外。第一，“工合”宣传经济民主，主张调解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万万不能容忍的。第二，“工合”对抗日根据地也提供了帮助，这使国民党顽固分子极为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这种矛盾态度不仅表现在政府中始终有一部分人支持“工合”，而另一部分人反对它；同时也表现在某些人或派别此时支持它，彼时又反对它。

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伙人始终是“工合”的破坏者。早在“工合”筹备时，周恩来就嘱咐艾黎，“对参加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员，最好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以使工合不致发展成一个官僚机构”。<sup>⑥</sup>周恩来的这些想法，对艾黎有很大启发。“工合”的各级

组织成立时，许多民主人士被吸收进来。陈氏一伙对此十分恼火。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有一个合作社管理局，成立于战前。陈氏一伙认为，可以利用它将“工合”吃掉。他们以两套合作机构并行、互相干扰为由，提出对“工合”进行改组，借机将“工合”取消。斯诺等人看穿了陈氏一伙的险恶用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一个时期内，“工合”与合作社管理局之间的矛盾极为紧张。斯诺等人认识到，陈氏一伙是国民党中的当权派，强行与之斗下去，对“工合”不利。斯诺采取给在美国的宋子文写信的办法，要宋出面帮助“工合”。接到斯诺的信后，宋立即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电报，向他们详细陈述了改组“工合”将会造成的损失，要他们加以制止。蒋介石和宋美龄答应了宋子文的要求。由于有蒋介石出面，一时顶住了陈氏一伙对“工合”的破坏。

大量事实表明，国际友人是“工合”运动的发起者，重要的组织者。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的历史条件下，“工合”运动能迅速崛起，并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成就，与国际友人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 二、国际友人对“工合”运动的影响和贡献

1. 国际友人的参加，加快了“工合”运动的崛起。援助“工合”的国际友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人民的真正同情者，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们看到“工合”这个可以改善民生的运动崛起，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它的支持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艾黎是这部分国际友人的最典型的代表。艾黎的父亲弗里德里克·艾黎是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由于是英国移民的后代，在新西兰享有许多特权。但他对英国殖民者残酷杀戮新西兰土著人十分不满，他十分钦佩土著人首领路易·马尼波托，这位首领曾率领土著人同英国殖民者进行过长斯的艰苦卓绝

的斗争，给英国殖民者以很大打击。当自己的儿子降生后，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路易·艾黎。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形成了艾黎同情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艾黎于1927年4月来到中国。由于工作关系，他走访过中国的许多工厂和农村，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有亲身的体验。1929年华北大旱，1930年长江发大水，他都参加了救灾工作。在这两次救灾中，他先后领养了两个无人照顾的孤儿，一直将他们培养到大学毕业。由此可以看到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另一类国际友人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支持“工合”，是由于“工合”是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工合”推进会的领导人大多属于这一类。这些人一般地位较高，经常从事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认识到，帮助中国“工合”，同时也就是在帮助他们自己，因为“工合”的发展，可以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减轻法西斯努力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压力，尤其是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压力。不论是从同情劳苦大众出发，还是从抗击法西斯侵略出发，这些国际友人支持“工合”是自觉的、主动的、真诚的，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国际友人参加，“工合”运动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若没有这批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工合”要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

2. 国际友人为“工合”引进了新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30年代的中国，“只存在具有中世纪特点、按行业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只在个别的几个城市才具有现代工业的萌芽。”<sup>①</sup>在这些落后的工矿企业中，工人地位很低，不合理现象到处可见。许多国际友人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对企业中这些弊端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在协助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引进了许多新的管理方法，以克服旧企业中的缺陷。“工合”运动中一句十分诱人

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工合”的章程规定，“股东应在社工作，工人应为股东。”<sup>⑧</sup>“工合”工厂带头提高了工人工资，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使这些工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许多人争着到“工合”工厂去做工。“工合”工厂能够较平等地对待工人，基本上克服了旧的工矿企业中的野蛮手段。《工合三字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社职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sup>⑨</sup>这些是对“工合”民主管理的生动概括。为了保证所有社员都享有权利，同时又避免经济实力强大的个人垄断合作社事务，合作社的组织章程规定，每个社员至少持有一张股票，但任何社员拥有的股票不能超过全部股票的20%；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社员只能有一票投票权；合作社例会需全体社员参加，开除社员社籍需要半数以上的人同意。这样，极大地调动了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合作社事务的民主性。“工合”引进的这些新的管理方法与旧中国其他工厂的管理措施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在当时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赞扬。著名学者陈翰笙说：“工业合作社，是生产者自己的组织，没有包含半点反生产的意义。”<sup>⑩</sup>“工合”菲律宾推进会的塞尔夫人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说：“每个合作社社员都是所有者，因而又是领导，各社上下明显地有一种新的社会觉悟。”<sup>⑪</sup>

“工合”民主管理的意义决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从近代世界的发展来看，公民民主意识是在他们享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因为只有公民在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事务，民主意识才真正在他们之中扎下根。而民主意识一旦形成，它就决不会只限于经济领域，它

将冲破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重障碍，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建立一个世界。从这个角度讲，“工合”的民主管理是对民主意识的培养和训练。正因为如此，宋庆龄说：“工业合作社，代表了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及民主政治的教育。”<sup>⑫</sup>

历史已充分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今天，对外开放已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策之一，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一个国家，当它蒸蒸日上时，胸怀总是向世界敞开的，既为世界作贡献，也接受世界给它的贡献。

#### 注：

① 罗比·尤恩森(美)：《宋氏三姐妹》，第10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③ 同上。

④ 尼姆·威尔斯(美)：《中国为民主而建设》，第189页，凯利·威尔士出版社，1941年英文版。

⑤ 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第25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⑦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24页，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

⑧ 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1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⑨ 米鸿才：《合作社发展简史》，第13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月版。

⑩ 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1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⑪ 尼姆·威尔斯(美)：《中国为民主而建设》，第19页，凯利·威尔士出版社，1941年英文版。

⑫ 斯诺：《斯诺文集》，第3卷，第6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